

论章太炎讲学中的时代变革精神

韩 昇

中国的 20 世纪是在凄风苦雨的政治黑夜里来临的。

新世纪伊始,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的章太炎在浙江余杭家中编定他的第一部论学论政文集《诂书》。书首识语落款为:“皇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章炳麟识。”皇汉辛丑年是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这一年,南明灭亡,清朝基本完成统一全国的帝业。章太炎用“皇汉辛丑”纪年,意在向世人明白宣示其反清的革命立场。若再进一步深思,用此落款更寓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决不是一场旧戏中的换幕,决不是人们早已习惯的王朝更替、循环反复,而是具有革命性的质变。

激情澎湃且具时代敏感的章太炎已经朦胧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到来,他用自己的论集为新世纪的降临作了振聋发聩的预告。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举步艰难的变革大致与《诂书》揭示的方向相符合,亦即在社会生产、政治体制等外在形态和文化变革、精神创新等内在形态发生了根本意义的革命。

在这两方面的变革中,章太炎都是勇敢的先锋战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主持《民报》,鼓吹革命,为辛亥革命进行了理论准备,造起浩大的声势;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以军事手段镇压南方革命军的白色恐怖日子里,他只身入京,当面揭露袁世凯企图窃国称帝的阴谋。鲁迅概括其事迹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①

政治上不屈不挠的巨大形象,多少遮掩了他在文化革命和学术研究上的光芒。鲁迅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上的还要大。”造成这种印象,章太炎也有其自身的责任:他的文章古奥艰深,又喜欢用冷僻的字词,实在让人难以卒读。当年,他在东京开班讲授国学,弟子云从,如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黄侃等后辈俊秀,聚集一堂,蔚为大观。至于讲学的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鲁迅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旧学根基如鲁迅者,并不多见。而鲁迅博闻强识的脑海里尚且留不住其讲学的只言片语,则不知所云者必有人在。

一脑子革命思想,却耽于旧时代的语言表现形式,造成旧瓶装新酒的奇异现象。内容与形式的乖离,自然大大妨碍其思想的传播。对此矛盾直观而浅显的解释,是否可以理解为其士人

的文化自负。汉学世家的出身,养成他作为文化承继者的自负;而追随名师学业卓著的成就感,又激发他以弘扬民族文化为使命的自负,后者的影响尤其不能低估。上述双重的文化自负,潜移默化间形成了章太炎以文辞自高的心态。名师的背景、古典的文体和朴学的修养,造成章太炎形象上的错觉:一个是政治激进的革命先锋,一个是文化保守的儒学大师。在革命的年代渐渐远逝之后,那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章太炎的形象也随之淡化,而学者章太炎的形象则凸显出来,折射在新一代学人心目中的章太炎,更多是旧文化代表的长袍国旧形象。

当然,这对于章太炎而言是不公平的,也是一种误会。透过章太炎艰深难懂的文词,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为新的文化的诞生而奔走呐喊、冲锋陷阵的背影。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如其政治事迹一般,已有众多的研究,而其著作也大体整理出来,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即是。引起我兴趣的是常被忽视的章太炎讲学活动。最近,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把章太炎的讲学活动整理成下表,让人一目了然。

| 时 间 | 地 点 | 情 况 | 备 考 |
|------------------|----------------|--|--|
| 1908 ~ 1911 年 | 日本东京 | 为青年留学生讲国学。 | 《教育今语杂志》第 1 ~ 4 册,《章太炎的白话文》。 |
| 1913 年 | 北京 | 主讲国学会(未满一月,被袁世凯逮捕入狱)。 | |
| 1918 年 | 成都 | 讲国学。 | |
| 1922 年 | 上海 | 江苏省教育会请讲国学,共十次。 | 1922 年 4、5、6 月《申报·国学讲演录》,《国学概念》,《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
| 1923 年 | 杭州 | 在第一中学讲学两日。 | |
| 1924 年 | 南京 | 在教育改进会年会上讲演。 | 《集外集拾遗》。 |
| 1925 年 | 长沙 | 在晨光学校讲演。 | 1925 年 10 月 11 日《申报·湖南晨光学校演说辞》。 |
| 1929 年 | 上海 | 在震旦大学讲《说我》。 | 《制言》第 48 期。 |
| 1932 年 | 北京 青岛 苏州 | 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在青岛大学讲演。 在苏州讲学约一月。 | 《中法大学月刊》第五卷第 5 期,《师大月刊》第 10 期。 1932 年 5 月 30 日天津《大公报·章太炎昨抵青岛演讲》。 《苏中校刊》第 67 ~ 69 期《记章太炎先生讲儒行要旨》、《记太炎先生讲大学大义》、《经义与治事》、《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源流》。 |
| 1933 年 | 无锡 苏州 | 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国学之统宗》、《适宜于今日之理学》;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 在苏州主讲章氏星期讲演会。 | 《章太炎先生讲演录》,《国学商兑》第 1 卷第 1 期,《国学论衡》第 2 期,《制言》第 52、54 ~ 57 期。 |

| | | | |
|------------------|----|--|-------------------------|
| 1934 ~ 1936 年 | 苏州 | 主讲章氏星期讲演会。章氏国学讲习会,对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作系统的讲述,最后教授《尚书》、《说文》部首。 | 《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记章太炎先生》。 |
|------------------|----|--|-------------------------|

从章太炎的讲学活动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讲学内容越来越和社会现实相联系,强调“切要之学”。因而在学术上,也越来越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

从治学的层面而言,以史学为根基可使学问不至流于空洞,故章太炎视之为教学之正道,指出:“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其书虽广,而文易知;其事虽烦,而贤人君子之事与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如此则诡诞者不能假,慕外者无所附,顽懦之夫亦渐可以兴矣。”^②

然而,从学术源流来看,他受顾炎武所创浙西学派的影响较大,注重经学。其师俞樾精研经学,所主持的诂经精舍以“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为宗旨^③,他本人在诂经精舍七年所接受的基本上是经学教育。像他这样一位经学浸洽的人物来强调史学的重要性,不能不说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转变。因此,他对史学的强调不能仅从治学进阶上去理解。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时,对学术作分类,提出:“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1、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2、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3、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④其时章太炎是把史学附庸于经学和文学,对学术分野的认知完全是旧式的。两年后在南京讲演时,他开始转变对史学的认识,提出“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此后,他对史学重要性的强调日益高涨,1933年讲演《历史之重要》时,他把史学与经学并列,甚至说:“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1934年,他修正了以前对学术分野的看法,指出:“一、经学以明条例求进步,二、史学以知比类求进步,三、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四、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⑤至此,在他的学术分类中,已经把史学彻底解放出来,成为与经学和文学并列的独立分野。不仅如此,如果仔细对照他前后两次的分类便可发现,其对史学的规定完全照搬以前对经学的规定,也就是说,史学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以前经学的作用而成为首要之学。

二

如此注重史学,甚至以之代替经学,对中国传统社会所造成的震撼,具有革命性意义。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政治统治一切。如果说人类的劳动是以货币为尺度来计量,那么,中国还多了一种特殊的尺度,就是“官”。从物质到精神世界,一切都可以用“官”来换算:人的价值、社会地位、服饰车马、经济收入、居住标准,乃至善恶美丑、是非标准、行走坐卧的规格、接人待物的礼仪,无不以“官”身份来决定。法律甚至规定了“官”与“钱”的汇率,如古代有“赎刑”的规定,犯什么罪可以用多少钱来赎,其上明文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可以“当”多少刑。而且,在“当”的顺序上,“官”优先于“钱”。现实也是如此,故“官”大于“商”,商人要向官人进贡红包。

专制政治与官本位互为因果,而其固定与强化则依赖于等级制度,三位一体,从根本上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或可美其名曰“管理”着社会。这样,我们便能看到像胡雪岩那样的“红顶(二品顶戴)”商人。商人顶着个官帽子,不伦不类,看着滑稽,但这就是中国官本位社会的特

征。

这种特征决定了统治者不承认“官”以外有其它独立价值体系的存在,一切都必须以“官”为准,构成整个社会价值的轴心,哪怕精神的创造、学术的优劣都不能例外。哪怕再经不住学术、良知与时间的检验,但统治者总还是要用权力来钦定学术的高下,以纳入其等级特征的价值体系之中。因此,学术和学者也必须顶起官帽子,于是便有了诸如经学的崇高与技艺的低贱等等。座次是排定了,无形的精神世界也终于有序可依,能够量化管理,但学术的独立价值却沦落为官场附庸,社会的脊梁骨被硬生生地压弯压驼。

文化以官场为最终指向,文人便以当官为归依。孔子最早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学问做得好的当官,那么,留下来做学问的当然是饭桶了。学术独立的精神就这样被廉价拍卖了,而学问自然也就成为投机钻营的工具。读书为着考试,考试为着做官,做官为着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即使卑微些也强过当学者。就这样代代相因,在千百年的岁月中不断巩固强化,“学而优则仕”的功利精神从根本上篡改了学术的性质,扭曲了学者的品格,以至到近现代,学术仍然挺不直腰杆,学人依旧经不住官场的诱惑。用封官来奖赏学术,加重了学术行政化的趋向,使得不少有前景的研究早早夭折;公益事业心颇为欠缺的求官者源源而至,造成官僚队伍的急剧膨胀和腐败,文化和文人都被看贱了,学风也被功利之风所压倒,学术积累的欠缺和对学术史的无视、无知,造成空洞浮躁,急功近利,自吹自擂,剽窃抄袭等等丑陋现象。凛冽寒风中奔走狂呼的范进,是有文化的无知,是统治者改造文人的杰作,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对学术的愚化主要通过官式科考的手段来实现。中国没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大学,却有着千年不改的科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超然独立的教育,只有追随政治需要的驯化。这种驯化的精神,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浸透于官方指定的儒经之中。古代铨选考试,原来主考儒学经典,后来又加上文学辞藻,明经、秀才、孝廉、进士,不论考的是经书的直接背诵,还是用文学笔调的润色传抄,无非都是一种政治的冶炼。因此,经学在古代为官学,既用于求官,也用于治国,以经入法,以经判案,乃至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不一而足。就这样,在社会总体贯彻的官本位原则,落实到精神世界则是经学对诸学的垄断,一环套一环,把社会良知牢牢地管制起来。

面对千年凝固的传统势力,章太炎强调史学的呐喊,犹如划破暗夜的闪电。早在本世纪初始,章太炎便以一篇《订孔》揭开对孔子的批判,他斥责孔子以学干禄,奔走于权贵之间,依人作嫁,品格实不足取。而其《学变》、《学蛊》、《王学》、《清儒》诸篇,系统研究了儒学神学化的历史过程,把儒经还原为人类文明史,用以明进化,审因革。社会政治运动的先声,总是从思想禁锢的深处响起,章太炎对儒学的批判,激励一代青年,汇聚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洪流。

章太炎对儒学的批判,追求的不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更是国家的改造和历史观的变革,这种思想的产生,来源于他的革命实践,亦来源于其对历史的研究。1925年,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讲演道:“历史为祖孙相传之信物,凡伟大之人物,皆由参考历史得来”;1932年在燕京大学讲演时说:“现在的青年,应明了是甚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甚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甚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如果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凄凄惶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实践经验的积淀与升华而来的智慧的理性,因此,人从来都是历史中的人,也一直生活在历史铸造的环境之中。只有知道过去,才能理解现在,进而预测未来,这是永远无法割断的过程。凡是想在社会实现

自我价值、活得有意义、活得潇洒自在的人,都需要通过理解历史去找到自己的现实社会中应有的、真实的位置,明白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局限性,充实而不轻狂。历史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完成自我的人格塑造,教我们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己从各种束缚中挣脱出来,融入历史进程的滚滚潮流。轻薄和嘲弄历史,其实是在作贱自己,在对社会人生的盲目无知中自作聪明地跳梁。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往往被权力欲望蒙住眼睛,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根本道理,只想从历史索取翻云覆雨的权术,同时通过愚民政策实现对历史的垄断和封锁,造成社会上下对历史理解的肤浅,甚至歪曲,因而迫使中国社会多次灾难性地重复历史。

知比类,求进步,章太炎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其史学研究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救弊济世,变革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运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方面,章太炎的史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第一,革命性。章太炎研究历史,是以此作为认识和解剖现实世界的锐利武器,为的是寻找社会弊病的根源,以构建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他曾坦言:“兄弟从前主张推倒满清,所以要研究国学;因为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推倒满清。研究国学与推倒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其实就是一项事。”^⑥推翻清王朝是推翻中国绵延千年的专制统治,以实现社会进步。专制主义为什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呢?章太炎通过对《老子》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老聃之言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斯言乃可谓洞见专制之真相矣。”^⑦也就是说,以往将老子作为愚民政策的鼓吹者实是一种误读,相反,是老子揭示了专制主义扎根于愚民政策的真相,因此,要彻底铲除专制极权,就必须普及文化,学习历史,知道专制主义发生发展的真实过程,使其无处藏身。

第二,民族性。1906年,章太炎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明确提出研究国学的目的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视国学为民族的命根子,1923年,他在《华国月刊发刊辞》中指出:民族文化存,民族不亡;民族文化亡,民族亦亡。实际上,他一直把国学作为保存国脉的事业来弘扬,1913年,他在开办国学学会时提出:“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而其弟子创办的《华国月刊》开宗明义道:“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旨”。其所谓“国粹”,指的就是国史,因为史学最能体现民族的精神,也最符合学以致用目的,“若一国的历史已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因为事实是综错的、繁复的,……而历史乃是归纳这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变迁,这都是人类处世所不可须臾离的。假使明了历史的演进,根据他以致用,这是无往不利了”^⑧。

近代史是一部社会革命与国家独立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曾经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推翻清政权时,它是号召民众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时,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它统一了人心,鼓舞起斗志,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克服民族自卑与民族虚无心理,对内破除封建文化,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成为新文化建设的支柱。

第三,时代性。如果说章太炎的史学是民族主义的史学,那么,其产生则是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1934年,章太炎在《与邓之诚论史书》中说道:“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他所说的忧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时刻,章太炎

不能亲自上战场抗击敌人,他“唯有淳海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⑨根据历史经验,他坚信哪怕国家灭亡,只要国学在,民族精神在,中国还将复兴。在《答张子鸾问政书》中,他征引历史道:“惟民族主义日日沦浹胸中,虽积之十百年,终有爆发之一日。宋亡民不能救也,逾七八十年而香军起;明亡民不能救也,逾二百七十年而民国兴,……有民族主义在其胸中,故天下沛然响应也。”响彻历史的悲壮,是与天地同在浩然之气。。

为现实而研究历史,是章太炎的主张。1933年,他在无锡师范学校演讲《历史之重要》时,提出:“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他一生都是以现实需要作为治史的出发点,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及其党羽鼓吹“禅让”,宣扬尊孔,图谋复辟帝制,为此,他作《驳建立孔教议》和《正义》等论文,运用史实进行有力的批驳;他还撰写了《儒侠》、《鲁颂》等文,正面称颂盗跖,赞扬人民的革命。无论是他早年撰写的《馗书》,还是晚年重新修订的《检论》,无不透露着时代精神气息。

章太炎的史学,不同于客观超然的纯学术研究,更多是那个时代思想的反映,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对历史的洞彻,以引领时代精神的变革。

三

由此看来,由于章太炎的文字冷僻深奥而把他看作旧文化的代表者完全是误会,但把他视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也不妥当。如果从学术角度加以评价,其学问和现实政治联系过于紧密,与现代学术规范相去尚远,似乎也难于将他划入现代学者的行列。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章太炎所受的教育和治学方法的训练属于传统经学,但由于他激进的政治思想和长年的革命活动,使得他所追求的学问早已和经学分道扬镳了。从思想上看,他倒是和近代学术有不少相通之处。

立足于今天的社会去反观历史,用当代的问题意识去研究历史,与近代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阐释的意义,并不相悖。历史终究是当代人对过去的回顾与反思,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时代,甚嚣尘上的影射史学臭名昭著,以至我们至今都尽量回避历史为现实服务的问题。这多少有些矫枉过正。其实,应该反对的是歪曲史实、观念(或观点、理论)先行的牵强附会任意取舍、夸夸其谈的总体模式等等,也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直接介入与混淆。如果我们坚持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尽量达到客观公正的要求,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过程及揭示的历史意义便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而且,不管是有意无意,作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都会有当代的影响,大可不必对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做鸵鸟式的回避。章太炎在此问题上的主张,虽然与当代学术规范不是一码事,但对于传统学术的解放却颇具意义。

章太炎对史学的重视,打破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揭示历史的真相,阐释历史的意义,这一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历史学术化、规范化的过程。而且,章太炎热心于学习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试图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上。他晚年撰写的《易论》深值注目。《易》是儒说基础文献,经过历代的粉饰,早已是高深莫测的神学。章太炎的研究,运用人类学和进化论的理论,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阐释《易》,把它还原为一部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解释人类生活习俗、私有制度与社会组织形成过程与卦爻词的内

在关系。从章太炎所赞同的“六经皆史”主张,到贯彻于《易经》的史学研究,可以看到他力图将国学改造成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和理论性的学科,把神学、玄虚之学变为科学。

改造国学与变革社会的活动,决定了章太炎乐于接受西方学说和广泛接触革命青年的特点,像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早年都与章太炎有深厚的关系。这种交往,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的构建具有特殊意义。其中,章太炎与胡适的交往颇显异彩。胡适是最具声望的自由主义学者,其学问完全是西式的,而章太炎虽然吸取了一些西方思想,但其学问仍跳不出传统国学的窠臼。从学理与学术规范上看,章太炎与胡适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类型。然而,他们交往甚笃,其往来书信留下了这段深值纪念的历史。章太炎想改造国学,胡适想引进西学,他们的意趣并不相同,但在建立中国近代学术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客观地看,他们两人在文化革命的活动上要比其学术成就更具影响,一个奋勇破旧,一个竭志立新,他们的结合,合力推动旧学向新学的转换,构建起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章太炎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交往,是两代人的交流,他们思想各异,性格不同,却能融洽相处,气类相投,最根本的是他们都具有共同的品格,那就是坚持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学术的自由和批判的精神,把对社会的责任化作个人的道德责任,以个性化的学术激励时代精神,引领着文化的变革。

四

这种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批判精神,在章太炎身上是一贯的。这里不能不论及其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学术回归的问题。一般以为,章太炎的这种回归是思想颓唐的表现。以革命始,以颓废终,这种人物评价模式在传记中屡见不鲜,尤其对历史人物晚年的研究,价值判断大量介入甚至代替史实过程及其背景意义的客观阐释,暴露的往往不是研究对象的思想断裂,而是研究者分析批判精神的丧失与研究角度的随意转变。

如上所述,章太炎到晚年仍讲学不辍,批判性精神亦高昂不衰。因此,其晚年对国学的回归,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决不能随意转变视角,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的价值判断打发了断。章太炎早年为了追求学术与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强调批判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学术扬弃,也是对附加于国学之上的政治的、伦理的、神化的各种附加物的剥离,这双重的批判尤其以后者为重,在剥下儒学的神圣外衣时,也将它解放出来,恢复其学术的地位。因此,这种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到新文化逐步建立起来后,对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重新认识、评价和定位,以重构新文化内核,便成为突出的和不可回避的课题。扬与弃是理性批判的两个侧面,没有任何理由认定批判就是进步,而肯定就是落后。章太炎对孔子的批判就是这样一个扬弃的过程:早年,他批判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晚年,他同样反对定孔学为国教,但他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孔学。他偶尔对自己年轻时代批孔的过激言论有所检讨,但这同样不表明他放弃对孔子以学干禄的批判。因此,他的反思,是长年学术体悟而具有的深邃对青年时期浅显激进的纠正,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学术的建立有赖于对客观世界的睿智批判,而思想的升华更需要深具勇气的主观世界的内在批判。人类的认识如果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那么,批判的精神便不会终止。

章太炎的那种个性张扬的批判精神,还来自其痛苦的革命实践。他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为

社会政治变革奔走呼喊,但他肩负太多的道德责任,充满自主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伦理准则,换言之,他学者的一面胜过政治家的一面,他太“书生”了。因此,他不能作无原则的服从,不懂得理想只是用来掩饰需要的权力实质,所以,他总是被政客耍弄,一次次被欺骗,一次次品味理想破灭的痛苦与失落。而这些都在无形中化作砥砺,使他更加坚持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立场,终身未变。如果说他曾经反对“赤化”,那么,必须指出他同样批判蒋介石对民国精神的背叛,如同他投向袁世凯的刀枪;他甚至自称“中华民国遗民”,以示对理想的坚持和对污浊的权力世界的决裂。他的社会革命道路已经被封堵,所以只能通过对学术的探究来对革命进行反思。但只要一息尚存,他还要抗争,还要为民族鞠躬尽瘁。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从书斋里奋起了,拖着衰老的身躯北上,试图说服张学良抗战;他为冯玉祥部的喜峰口抗日而欢呼;他声援“12·9”学生运动,致书蒋介石,要求他以抗日作表率,而这封书函是他用生命最后一点气力写就的。思想的颓废往往起自政治的堕落,但我们在章太炎身上丝毫看不到道德与政治的堕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我人格的保全与批判精神的闪烁,概括这样一位顽强不屈的老人,怎一个“颓唐”了得!

章太炎是世纪降临的风雨暗夜里筚路蓝缕的先驱,透过老式的服饰,内里却是青春般的激情涌动,留给我们个性张扬的批判精神,将是接引下个世纪到来的火炬。

(作者韩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邮政编码:361005)

[责任编辑:林建曾 明秀丽]

注:

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收于《且介亭杂文末编》。以下鲁迅引言均同此,不再出注。

②章太炎《教学弊论》,《华国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③俞樾《重建诂经精舍记》,收于《春在堂杂文》卷一。

④章太炎的演讲,均引自表中“备考”所注文献,不再一一出注。

⑤《制言》第四十八期。

⑥《醒狮周报》第五十八号。

⑦金毓黻《国学会听讲日记》,《东北丛刊》第七期。

⑧《中法大学月刊》第五卷第五期。1935年,章太炎在《答张子鸾问政书》中明确说道:“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

⑨1932年章太炎致弟子马宗霍书信手迹。